建道學刊 40 (2013): 1-54

二十世紀初中國內地會在新疆的基督教事業——歷史因素和發展[1]

黃玉明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木拉提．黑尼亞提的博士論文《近現代新疆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研究》[2] 在有關基督教事業上提出了一些重要論點：一是分析瑞典傳教士

[1] 本文是基於筆者在2010年在新疆舉行的「歷史上的新疆與中亞」學術研究會發表的文章〈1930年代內地會在新疆的基督教事基：歷史因素和發展〉，經過修改和擴潤而成，多謝新疆社會科學院「新疆通史」編委辦公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給我機會認識眾熱誠的學者；多謝香港浸會大學慷慨地容我使用館藏做研究；多謝邢福增博士借出珍貴資料。在此由衷地感謝他們的幫助。

[2] 木拉提．黑尼亞提：〈近現代新疆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研究〉，博士論文（南京大學，1998）。之後，黑尼亞提出版了以下相關文章：〈《瑞典傳教團南疆人類學調查報告》評析〉，《西域研究》第4期（1999）（與阿哈買提．艾賽因合著），頁數不詳；〈近代西方內地會傳教士在新疆的活動〉，《西域研究》第4期（2001），頁94～100；〈喀什噶爾瑞典傳教團歷史考〉，《西域研究》第3期（2002），頁數不詳；〈新疆內地會傳教士傳教經歷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西域研究》第4期（2003），頁83～90；〈傳教士與近代新疆社會〉，《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2005），頁63～72；〈族羣、宗教與國際政治：近代新疆基督教傳教士間諜案歷史考〉，《基督教與中國少數民族多元文化》第3期（2009），頁數不詳。

的文字、教育、醫療等事業，認為傳教士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雙重的，包括作為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及西方殖民勢力的一員，故此在評價上不能絕對肯定或否定；二是認為內地會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傳教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忽視新疆人民在醫療、教育方面的需要，而內地會在哈薩克族中傳教失敗的原因則是文化性質不同甚至衝突。[3]

筆者認為評估應考慮多元因素，包括傳教士的宗教性，因信仰是行為的理想指導，而行為的應用方面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是，這在歷史的時空中會遇到障礙，如政治、地理、經濟及人力等因素。他們在維護宗教性的同時，只能努力按擁有的資源來面對，行出其宗教性來。黑尼亞提的論點有不足之處：（1）只提到文化思想的不同，沒有考慮伊斯蘭教的宗教領袖和信眾對傳教士傳教的反應可以是多元的，需要在歷史資料中仔細觀察。（2）評估並未完全立於歷史的處境上，只想到宗教文化衝突，以及社會事業的貢獻不足，忽視了其他處境因素。不過，作者在帝國主義的說法上，提出了不應以偏概全，為內地會的胡進潔（George W. Hunter，1862-1946年）間諜案辯了屈。

本文將考慮多元因素，包括宗教因素，用以重塑及重估歷史。筆者除了闡述二十世紀初的新疆環境因素外，更考慮這時期兩個有關人力和政治因素的獨特轉變：（1）中國內地會正在這時期增加了不少的傳教士，其中有六個新力軍被派到新疆；（2）二十世紀初葉的新疆地方政府與蘇聯（沙皇俄國於1917年革命後建為蘇聯；1991年解體為俄羅斯）的關係，以及其時新疆民族主義的騷亂等威嚇。筆者主要探討的問

[3] 黑尼亞提：〈近現代新疆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研究〉，頁i。蔡錦圖也提到中國人對傳教士的三方面評價：一是傳播異於中國傳統信仰的宗教；二是西方文化的輸入；三是視為與列強相關的既得利益者。見《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頁3。黑尼亞提所列大致上與蔡相約，黑尼亞提更表明傳教士在文字、教育、醫療上的貢獻是正面的。

題是：當時內地會傳教士來新疆「目的為何」？他們面對甚麼困難處境（包括獨特的困難處境）？他們如何回應？為甚麼？他們對基督教事業有何貢獻和影響？

以下從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的宗旨和特色，到參加內地會往新疆的傳教士的個別宗教體現和當時的環境條件，逐一討論其中與殖民地主義的關係；以及對新疆的傳道事業發展的影響。

一　中國內地會

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始於1866年。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對中國內地會及其創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年）有以下極高的評語：

> 該會的開端與發展都是基督宗教在華傳教史中最為精彩的一章。就其所發起的運動而言，該會的創始人戴德生牧師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之一；如果從他努力的結果來看，他是十九世紀帶着任何目的（或宗教、或世俗）來華的、最具影響力的四、五個外國人中的一個。[4]

戴德生作為一個傳教士，在歷史的記載上，竟是十九世紀來華的外國人中，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名。

以下就宣教與殖民地主義及社會事業的關係作出討論：（1）中國內地會的主要宣教宗旨和特色；（2）它如何面對十九世紀中國的民教

[4] 賴德烈著，雷立柏、靜也、瞿旭彤、成靜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9），頁326。

衝突 —— 被指控為殖民地勢力的政治工具；（3）被誤會與鴉片的罪惡買賣交纏的關係；以及（4）它的傳道事業與社會事業的關係。

（一）宣教宗旨和特色：以傳福音為主

根據賴德烈對中國內地會創會時的主要宗旨及特色的分析整理，包括：（1） 接受不同宗派的基督信徒成為它的傳教士。（2）但需具以下信仰：a. 相信整本聖經啟示；b. 相信聖經對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是終極和唯一的權威；c. 相信三位一體；d. 相信全人類因亞當的墮落都污穢了；e. 相信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具有救贖功績；f. 相信將來的賞與罰；g. 相信人的考驗和機會只限於今生。（3）不允許傳教士以個人名義收受基金。（4）傳教士盡可能與華人社會生活習慣一致，如穿華服、習當地語言。（5）內地會的領導在中國。（6）主要目的是傳福音，政策是在開闢新省份時，傳教站的設立依次是由省會至縣或州府級的城市，才至更小的城市，並且將注意力集中在福音未傳播的地方。[5]

對於內地會以傳福音為任務，賴德烈按內地會的資料指出：

> 該會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贏取歸依者，也不是建立及維持一個基督徒團體，而是**儘可能快地將福音知識散播到整個帝國**……該會相信，它所賦予的特殊任務就是傳播福音，收穫落到誰的手裏這個問題，對於該會來說只是次要的。因而，雖然該會進行

[5] 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頁329～330；中國內地會接納成員的信仰要求在該書的注119。內地會傳教士穿華服、習華語、按華人生活習慣的宣教策略，可見於湯普森（Phyllis Thompson）和蓋羣英（Mildred Cable）記載的內地會傳教士「三婦女」—— 包括蓋羣英自己，以及馮貴珠和馮貴石兩姊妹（Evangeline French and Francesca French）—— 她們所遇的中國人對她們的描述： "They wear our Chinese dress, and speak our Chinese words. Their cook also says they eat our Chinese food and use chopsticks." Phyllis Thompson and Mildred Cable, *Desert Pilgrim: The Story of Mildred Cable's Venture for God in Central Asia* (Nebraska: Back to the Bible Publishers, 1957), 28.

> 了一些醫療方面的工作（這也許和戴德生接受的教育有關），但是該會並沒有給予學校工作太多的重視。[6]

內地會的傳福音使命與其宗教信仰有極大的關係，他們認為全人類現今所處的污穢狀況，需要救恩來脫離現今這狀況和將來的終極審判。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和復活已經完成了救贖人類的工作，至於人能獲得救恩的機會就只限於今生，故此，傳福音被視為當務之急。

（二）面對民教衝突的立場：與自己國家的殖民勢力劃清界線

戴德生有句名言：「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2004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戴德生自傳：《帶着愛來到中國：戴德生自傳》。[7] 戴氏對中國人的愛是毋庸置疑的。從戴氏身上，除了隨着殖民勢力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進入中國外，我們看不見他是既得利益者。當中國國民因外國殖民勢力的入侵而仇視和攻擊洋教和洋人時，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有甚麼反省和政策呢？

1862年的楊州教案是引發戴氏在基督教傳教與政治力量的關係上作出反省的主要事件，詳情參呂實強：〈楊州教案與天津教案〉，在此不贅。[8] 1884年內地會編印的一份《原則與實踐》，當中提到內地會對

---

[6] 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頁330。這書於1929年出版；又參其注120。黑體是筆者所加。

[7] 這本書為戴德生所撰寫，涵括時間自他出生至組成內地會（1832-1865年）。

[8] 林治平主編：《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四版（台北：宇宙光，1984），頁3～4、201～241。肇因為法國天主教教士金緘三開設的育嬰堂被謠傳為殘害嬰孩，民眾遂襲擊駐當地的傳教士，包括內地會戴德生等，戴氏雖沒有向自己國家領事求保護，但此事仍避免不了外國政治軍事力量的介入。

民教衝突的處理政策 —— 就是與殖民勢力疏遠，不使用自己國家殖民勢力帶來的特權，遇事時不向英國政府或駐中國的領事上訴，但可向地方衙門尋求幫助。[9] 1895年12月的《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刊載戴氏的一封信 "Appeals for Redress, etc" 詳細地敘述了他的主張，[10] 就是不再訴諸於自己國家的介入以取得公道，他的分析是經過多年對事件的深入反思而得的。

> 若他們（注：傳教士）努力尋求公義，致使訴諸的勢力展示槍船，以開戰威嚇，這樣豈不是增加並確認了中國國民的誤解和對他們的刺激？[11]

他相信，一方面避免招致中國國民對傳教士生發更大的害怕和反感，令傳教士的傳道事業受損，也避免令中國知識分子對差會帶着政治意圖的誤解更嚴重；另一方面也避免引發自己國家以武力威嚇甚至攻打中國而帶來更大的惡。誠然，傳教士有因教案而失去生命，差會的物業有遭破壞，但都不能使他們的國家以更大的暴力傷害無辜的中國國民變得合理。

> 難道謀殺無辜傳教士的中國人比引發無辜的中國人受攻擊的人更應受責嗎？[12]

---

[9] 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頁171～172、179～181。頁180載有蔡錦圖引自《原則與實踐》的譯文。

[10] J. Hudson Taylor, "Appeals for Redress, etc,"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95* (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575-79.

[11] Taylor, "Appeals for Redress, etc," 576.

[12] Taylor, "Appeals for Redress, etc," 576.

戴德生更基於聖經細緻地解釋，傳教士應情願受苦、吃虧，不倚靠人的勢力藉上訴討回公道，卻倚靠神的幫助和相信神的審判，甚至愛敵人，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13]

從戴氏不向自己殖民勢力的國家求政治幫助看來，他是要擺脫傳教士和差會與殖民主義的政治關係，堅定在傳福音上與西洋槍炮劃清界線。

（三）面對鴉片貿易和傳道事業交纏關係的誤會：從道德角度反對來澄清

鴉片為害中國，遠於馬禮遜來華（1807年）之前，雍正時（1729年）曾禁止販賣鴉片和禁私設煙館。英國殖民勢力販運鴉片入華（1773年）至英國東印度公司直接經營（1780年），都在更正教傳教士到中國之前。[14] 英國東印度公司甚至在始創時（1600年）只為貿易，而不支持宣教。[15] 以致英國的傳教士威廉克理到印度宣教初期，也不能進入印度的英國殖民地。惟在福音派包括格蘭特（Charles Grant，1746–1823年）的努力爭取下，終於英國國會於1813年頒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法

[13] Taylor, "Appeals for Redress, etc," 577-79.

[14] 參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台北：宇宙光，1993），頁369～370。

[15] Trading Companies as Colonial Rulers: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hich originated in 1600…Primarily economically oriented and showing very little interest in missionary activity, the new Protestant rulers maintained a generally modest colonial church structure, which focus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ministry to the Europeans living in their territories." Klaus Koschorke, Frieder Ludwig, and Mariano Delgado, eds.,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Africa, and Latn America 1450-1990: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Grand Rapids/Cambridge: Eerdmans, 2007), kindle ebook, Loc 943.

案中，包括了准許英國傳教士進入宣教的條文。[16] 可見，英國殖民地勢力的伸展和鴉片貿易，都不必與宣教行動掛鉤；福音派主動要求進入英國殖民地，為的是宣教，而不是其他。

在戴德生的 "Appeals for Redress, etc" 信中，不僅提到中國知識分子誤會差會為外國勢力的政治媒介，他們更將之與英國賣鴉片給中國這事情聯在一起。故此，內地會除了與自己國家的殖民勢力疏遠外，他們在中英鴉片戰爭後，更積極參與反對鴉片買賣的社會運動 —— 禁煙運動。湯清指出傳教士竭力推行禁煙運動，尤其是英國傳教士就更加熱心。他提出三個原因：（1）「基督教國家」的人民經營鴉片買賣，阻礙中國人接受基督教。（2）吸鴉片毒害人的身心靈健康，又影響中國的經濟。（3）英國以武力強行將鴉片進口禍害中國，需要對所帶來的公共道德禍害負責。[17] 內地會參與禁煙運動主要有三方面：（1）內地會的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彙集傳教士的禁煙言論，於1882年出版*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一書，讓人認識鴉片帶來的道德禍

[16] The Charter of 1813: "It is the opinion of this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that it is the duty of this country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and happiness of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in India, and that such measures ought to be adopted as may lead to the introduction among them of useful knowledge, and of religious and moral improvement. That, in the furtherance of the above object, sufficient facilities shall be afforded by law to persons desirous of going to and remaining in India for the purpose of accomplishing these benevolent designs: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respecting the intercourse of Europeans with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be preserved, an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n which the natives of India have hitherto relied for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be inviolably maintained." Koschorke, Ludwig, and Delgado, eds.,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Africa, and Latn America 1450-1990: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kindle ebook, Loc 1174, 1182.

[17]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1987），頁617。

害。[18] 其中論點有：a. 使吸食者失去自尊和別人對他的尊重；他們在道德上是最軟弱的。b. 指出中國人也以吸鴉片為罪惡，譴責吸鴉片的人，以之類似賭博和放蕩不羈（gambling and licentiousness）。中國政府不會聘請他們，教會也不能接受這些人加入。c. 這罪惡也影響了傳教士的傳道工作，吸鴉片的人大部分不易戒除毒癮，甚至會中毒死亡。d. 中國人認為從事鴉片買賣的國家應負上責任，傳教士也站在中國人的一方反對之。[19] （2）促使英國政府禁煙。英國終於在1908年答應逐年減產，以十年為限，每年減產10%。[20]（3）開設戒煙所幫助吸毒者戒毒；其中內地會於1886年按立的席勝魔牧師在山西開設天招局（戒煙所）。[21] 內地會於1895年共開了35所戒煙局，1905年82所，及1915年54所。[22] 奧斯汀（Alvyn Austin）在《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中也申明內地會在這方面如何努力推行禁煙運動。[23]

---

[18]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 —— 歷史圖片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79），頁221。

[19] Benjamin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Smoking*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Paternoster Row, 1882), 32, 44-45, On Openlibrary.org, <http://archive.org/stream/truthaboutopiums00broo#page/ n3/mode/ 2up> (accessed 20 October 2012);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頁373～387：載內地會的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和戴德生禁煙言論（中譯文），此外，也載其他人如李修善（David Hill）、馬雅各（James Maxwell）、楊格非（Griffith John）和理雅各（James Legge）的。

[20]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頁221；《基督教與中國論集》，頁372。

[21] 林輔華、鮑康甯：《李修善與席勝魔：向毒品宣戰的先鋒》（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2006）。

[22] 何斯德：〈中國內地會五十年紀念誌略〉，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5年》（台北：中華教會研究中心：橄欖文化基金會，1983），30。

[23] Alvyn Austin, *China's Milli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Grand Rapids/Cambridge: Eerdmans, 2007), 14-15. 《億萬華民》也譯作《中國億兆》。

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傳教士來自鴉片買賣的國家，必然與他們一伙，但傳教士卻從道德的角度反對鴉片買賣，甚至站在中國人的一邊，共同推行禁煙運動。不僅如此，林治平更根據這書記載的傳教士言論有力地指出，海班明實際上是攻擊了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因為英國強迫中國政府接受鴉片進口，是對國家不公義的事情，也是要求英國停止鴉片貿易的最首要理由。英國政府賣鴉片對中國人民做成了禍害：引誘了中國人，並養成了習慣，摧毀了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這罪惡的貿易，需要英國人民整體負上責任，故此必須禁止。[24]

（四）醫療與傳道的關係：內地會看前者為後者的有效媒介

戴氏蒙召到中國宣教，為此他事先作了一些準備：一是學醫，二是學習完全依賴神，把生活各方面，憑信心藉祈禱交託給神。[25] 有關學醫，他是受《中國：現況與展望》影響，認為醫療知識有助宣教，能預備中國人的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之維持生計。

> 我決意順服主，回應祂的呼召，到中國去。按這方向，**我正習醫，盼望日後在中國時可以更有效地服侍，甚或以醫療工作維**

[24]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頁374～375。 Broomhall, *The Truth about Opium-Smoking*, 11: "This is the one great contention of those who are seeking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All other points are secondary, and of little importance compared with this." "We owe much to Chlina. We have deeply injured the people of that land. The evil we have done we cannot undo, and the evil now being done we cannot prevent. Multitudes, tempted by the drug we have spplied, and compelled their Government to admit, have formed habits which will be the ruin of their families and themselves. We have set in motion forces of evil which we cannot now control, and this we, as a people and nation, are responsible for."(14)

[25] 馮浩鎏：《長江杏林：來華八醫師》（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7），頁15；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頁327。

持生計。然而，我將一切交主手裏。我深信，我若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一切需用祂必賜予。[26]

戴氏在赫爾受聘為哈迪醫生（R. Hardey）的助手。[27] 之後，在倫敦醫學院學習。由於中華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cation Society）急着差他往中國去實踐福音召命，戴氏於1853年初次入華時還未獲得醫生執照，要待八年後（1861年）才在回英國時完成醫學訓練。

戴德生以看病來接觸宣教對象。不僅戴氏重視醫療宣教，不少內地會的傳教士同樣能給人看病。按1901至1920年的資料，內地會的外國職員有15個男醫生、4個女醫生及8個護士；[28] 在華八十五年總共有85個男醫生、21個女醫生，及不少護士。[29] 由於中國貧窮落後，缺乏醫藥，偏遠的大西北更是這樣，故此，醫療宣教一般被傳教士視為有效接觸福音對象的途徑。面對龐大的醫療需要，中國醫療人員必須增加。按1901至1920年《中華歸主》的資料，內地會的中國職員有12個男醫生、23個畢業護士及49個肄業護士，正如它的評語：「1910年以後中國醫生的增

---

[26] 馮浩鎏：《長江杏林》，頁15。黑體屬筆者的。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Containing Allusions to the Antiquity, Extent, Population, Civilizati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London: 1838), 112; available from <books.googlecom.hk>: "…for though the celestial empire literally swarms with medical works and apothecaries' shops, yet the number of successful practitioners we believe to be small. For the most part, their medical practice is mere quackery; and their surgery, in modern days, does not extend beyond puncturing, cauterizing, drawing of teeth, and plastering, without attempting any operation in which skill or care is required."

[27] 馮浩鎏：《長江杏林》，頁15。

[28]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蔡詠春、文庸、段琦譯：《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7），頁791。

[29] 馮浩鎏：《長江杏林》，頁7。

加，特別是專業護士的增加，是近十年來差會工作的最明顯特徵。」[30] 此外，在這段期間，內地會的醫院和藥房數目也不少，有醫院17所，藥房104所，擁有醫院的數目是在眾差會中的首五名，藥房的數目方面，則大大的拋離任何差會。[31]

1939年，中國內地會在上海的會議記錄中，記載了它的醫療政策，其中包括醫療事業意義的反省和工作的系統化，足證其在中國龐大需要的土壤上趨向成熟，內容如下：（1）基於主的命令 —— 要醫治病患和傳福音。（2）目的有三：一是傳福音，建立本色教會；二是醫治，尤其是貧窮和有需要的人；三是衛生，要傳遞羣體衛生知識。(3) 醫療方面：以醫院為基地，再在周圍開設分支藥房，安排醫療隊。又建立專科如產科、痲風科、肺結核科、眼科、耳鼻喉科等。醫院人手包括兩個醫生、兩個正式護士及一個業務經理。[32] 可見三十年代後期，醫療事業除了藉之接觸福音對象傳道外，其政策與二十年代的比較，是更有系統，並投放更多資源，建立以醫院為中心的分支藥房，延伸及加強影響力，並且清楚傳遞醫療事業本質的獨立意義。

段琦指出，清末來華的傳教士可簡單分為保守派和自由派，前者強調救贖人靈魂的福音事工，後者則重視學校、醫療及慈善服務的社會事業，而戴氏屬前者。[33] 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雖是以傳福音為主，仍以

---

[30]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801。

[31]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827～828。

[32] "The Medical Polic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Minutes of Council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on January 2, 1939, 12-13.

[33] 段琦：《奮進的歷程 —— 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務，2004），頁60～61。

醫療事業作為接觸福音對象的橋梁，而在三十年代後期的醫療政策的系統化上，看到醫療的需要確實影響了戴氏和內地會，使他們對之更重視和對其意義有更多反思；而二十年代的實際經營並不與三十年代的有很大差距。

二　二十世紀初內地會在新疆傳道的處境和進展

內地會是以福音工作為主，在新疆的工作算是全屬佈道性質。按《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資料顯示，二十世紀初更正教只有內地會和瑞宣教會（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又譯瑞典行道會）兩間差會在新疆工作。內地會於1906年才開始在新疆省會迪化（Tihwa，迪化於1954年改稱烏魯木齊〔Urumtsi，英文名稱則兩個都有使用〕）[34] 工作，期間先後有兩名傳教士胡進潔和馬爾昌（Percy Mather，又譯馬慕杰，1882-1933年）進駐該地；而瑞宣教會早於1892年開始在南疆喀什噶爾（Kashgar）工作，已發展至莎車（Yarkand）、韓城（Hancheng）和英吉沙（Yangihissar），至1920年共工作了二十八年。[35] 喀什噶爾有三名傳教士，莎車和英吉莎都各有兩名傳教士，總共七名傳教士。在基督教事業建立的時間上，瑞宣教會較內地會早而長；在傳教士的人數上則更多。內地會在時間和人力兩個因素上不及瑞宣教會，確使它的傳教事業發展落後。此外，瑞宣教會對於基督教在當地宣教的效用性的意見是：

---

[34] Theodore Shabad, *China's Changing Map: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49-71* (London: Mehuen & Co. Ltd., 1972), 313.

[35]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9～680。

在講漢語的人中，辦學校、傳道及分發短篇經文最有功效。在穆斯林當中最好是開設診療所、辦學校、收養並教兒童。[36]

他們的事工也與這些意見一致：喀什噶爾、莎車和英吉沙都有小醫院，還有診療所和出診服務；莎車更設有孤兒院。此外，還有三所初級小學和一所職業學校。與內地會純粹遊行佈道和派發短篇聖經大相逕庭。這兩種不同的宣教事工取向，是否便帶來懸殊的福音效用？以下筆者要考慮多元處境因素對傳教士傳道的挑戰：

（一）二十世紀初在新疆傳道的處境[37]

甲　地理和交通 —— 對傳教士體力的要求

新疆（過往曾稱中國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estan〕、東突厥斯坦或東土耳其斯坦）於1884年清末時期被建為新疆省，迪化成為省會（1955年新疆省成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烏魯木齊〔即迪化〕則成為首府），是新疆的政治中心。新疆屬中國西北的邊疆地帶，東部和南部與甘肅、青海、西藏相連，北部有沙皇俄國的西伯利亞、受俄國影響的蒙古（1917年前受沙俄的影響，之後也受蘇俄的影響。1911至1917年曾在承認中國為宗主國下自治，1921年宣布獨立，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西為俄屬土耳其斯坦（也稱西突厥斯坦或西土耳其斯坦），南

[36]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80。

[37] 資料主要源自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7～679；其次自國際科學委員會編著：《中亞文明史》第五卷《對照鮮明的發展：16世紀至19世紀中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2006）；《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編寫組：《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2000），二冊；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銀川：寧夏人民，1996），第九章。

有英屬印度。英國於1895年在南疆的疏附（屬喀什噶爾地）設了領事（初稱駐客遊歷官，1909年稱領事），[38] 從其位置可見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並與俄國和英國的敏感關係。

阿爾泰山位於新疆北部，南部有崑崙山，天山則將新疆分為北疆和南疆。在北疆的新疆省省會迪化傳道的內地會，不僅與在南疆傳道的瑞宣教會分隔，也與英國領事分隔。戈壁沙漠正好坐落在新疆和甘肅的交界處，使之與在甘肅省傳道的內地會分隔。在地理上，新疆可說是一處被山脈和沙漠封閉的地域。新疆面積遼濶，佔地約550,500平方英里，[39] 而戈壁沙漠為新疆的一大部分。[40] 沙漠中通行車輛的只有三條大道（迪化至喀什噶爾；肅州至伊犂〔Ili; Kulkja〕；迪化至庫麻古〔Ku-ma-cheech〕），其餘則靠駱駝、馬、騾和步行。那麼，對旅行佈道者來說，花在路上的時間和體力也不少。

因着新疆坐落在邊界，當傳教士進入這地時，並不像穿州過省般輕易。1927年的《億萬華民》記載，「三婦女」—— 即馮貴珠（Evangeline French，1869-1960年）、蓋羣英 （Mildred Cable，1878-1952年）及馮貴石（Francesca French，1871-1960年）—— 要回英休

---

[38] 《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編寫組：《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第二冊，頁116。

[39] 胡進潔以之比擬德國、法國和西班牙加起來的總面積。*George Hunter*,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in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 (1907)*, from <http://archive.org/details/ chineseempiregen1907broo>, by Marshall Broomhall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Philadelphia: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7), 292 (accessed 15 November 2012).

[40] 胡進潔引中國歷史家所說來形容旅行者要走過戈壁沙漠的困難： "For many miles there are no barbarians dwelling, or cattle grazing, nor is there water or grass, and moreover no one passes that way." Hunter,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假時，她們採取經新疆進入沙俄的路線，需要申請通行證（a personal permit）才可進入新疆，[41] 可見這是一個政治敏感的地域。她們穿過山道，走過沙漠，上路前必須預備足夠糧水，不然在杳無人煙的路上，進退維艱。蓋羣英回英後在內地會年會分享時發出到中亞傳道的挑戰，她提到，從她們的傳道基地 —— 甘肅肅州 —— 到迪化是四十五天旅程，而從肅州到喀什噶爾則是九十五天。[42] 至於從迪化到喀什噶爾則為五十四天。[43] 三個傳道基地距離遙遠，各自只能獨立作工，未能彼此照應。這是一個非一般的傳教地，不是任何傳教士都可以被派進來的，健康和體力是新疆傳教士必備的條件。

此外，迪化作為省會，與其他傳教站比較，還有它地域上的傳道困難。人口流動，人來了又去；城市人追求金錢，不像鄉村人純樸和較願意到教會聽道。迪化的周遭又不像中國其他地方有很多村落。[44] 不過，冬天時，人們又喜歡來到迪化買煤，使迪化在冬天有更多傳道的機會。[45]

---

[41] Misses French and Cable, "A Dispatch from Turkestan," *China's Millions*, February 1927, 21.

[42] Mildred Cable,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Asia: Address at the C.I.M. Annual Meetings in Queen's Hall," *China's Milliions* (July 1927): 101. 按胡進潔的敘述，他以「站」代替「天」， "from Urumchi, the capital, to Kashgar, fifty-four stages"，數目仍是54。Hunter,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43]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9。

[44] H. French Ridley, "Hard Ground," *China's Millions*, September 1927, 140.

[45] G. W. Hunter, "Contributed Articles — In Chinese Turkestan,"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 1910, 511.

乙　種族、宗教、人口及語言 —— 對傳教士語言能力和宗教文化知識的要求

新疆人口是由多元民族組成的。按內地會傳教士胡進潔的描述，主要民族包括突厥族（the Turks，或纏頭〔Chanteos〕，1935年正式稱為維吾爾族）、漢、東干人（the Tongkans，或Tunggans〔通干人〕，或Dungans，Chinese Mohammedans，自陝西、甘肅移入的回族，他們說漢語，有時也用阿拉伯語）、哈薩克族（the Qazaqs）、布魯特族（吉爾吉斯或柯爾克孜族〔the Kirghiz〕）、蒙古族（有不同部落）、滿族；[46] 還有鄰近的藏族，甚至鄰國的俄國人、印度人、其他中亞民族等。其中以維吾爾族為當時新疆的主流人口。[47] 伊斯蘭教是主要宗教，民族中的維吾爾人、哈薩克、回族、塔塔爾人、柯爾克孜人、烏孜別克人及塔吉克人，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48] 全省有一千多所清真寺，迪化有三十多所清真寺。[49]

---

[46] Hunter, "Contributed Articles — In Chinese Turkestan," 511-16.

[47] 自1949年後，因為新中國的移民政策，漢族在新疆的人數和人口比例上不斷上升。1949年，新疆總人口為433.34萬，漢族29.1萬，佔總人口6.71%，維吾爾族329.11萬，佔總人口75.95%；2000年，新疆總人口為1845萬，漢族748.99萬，佔總人口40.57%，維吾爾族834.56萬，佔總人口45.21%。自1949年漢族移入新疆的有300多萬人（其餘漢族人口增長原因應是本土出生）。李潔除、黎麗：〈試論1949年以後新疆漢族移民的類型與功效〉，2009年5月13日，「江西新聞網」，<http://news.qq.com/a/20090817/ 001060.htm>（2012年11月1日下載）。

[48] 《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編寫組：《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第二冊，207。

[49]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9。

新疆省地大人稀，1910年官方戶口統計為176.86，迪化有6萬人。[50] 1949年，總人口升至433.4萬；其中主流人口維吾爾族人佔329.11萬。至於哈薩克人，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及阿勒泰三個地區。1926年，人口約二十多萬；1949年，人口升至44.37萬。1944至1945年，迪化約有7288 人。[51]

南疆的喀什噶爾人口也有6.5萬及莎車有6萬，內地會和瑞宣教會能接觸的人口仍屬少數；而以迪化為起點，傳教士遊行佈道的足迹不到該省面積的五分之一。迪化、喀什噶爾、莎車都有漢族移民，而以突厥族人為多數。[52] 新疆因多元民族，語言也多元。二十世紀初，突厥語為通用語言；[53] 因漢人移入，在主要移入的城市也用漢語，但全省說漢語的人不超過百分之二十。[54]

胡進潔被譽為土耳其斯坦使徒，於1906年（清朝建新疆省以後）入新疆迪化傳道，而馬爾昌於1914年（民國後）加入。[55] 胡進潔帶着馬爾昌旅行傳道，遇見了眾多民族，[56] 他們如何能向這些多元民族傳福

---

[50]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8；French Ridley, "Hard Ground," *China's Millions*, September 1927, 140，認為當時迪化人口約五萬人，這反映對人口數字不一致的看法或人口流動的情況。

[51] 王希隆、汪金國：《哈薩克跨國民族社會文化比較》（北京：民族，2004），1、75～77。

[52]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8～679。

[53] 突厥語與蒙古語都屬阿爾泰語系，而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都屬突厥語支。

[54]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8。

[55] 馬爾昌於1910年到中國來，首先在安徽（Anhwei）學語言和服侍，直至1914年。"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July 1933, 136.

[56]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48), 52.

音呢？胡進潔初到新疆時，只有漢語的準備。他往喀什噶爾，開始學突厥語，在遊牧民族中生活讓他懂得蒙古語和哈薩克語。胡氏一面傳道，一面翻譯，他需要八種不同語言的聖經書卷來賣給當地的不同民族，[57] 大概包括突厥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蒙古語－加爾麻語、塔塔爾語、滿洲語、藏語、漢語、柯爾克孜語。[58] 在此不能不提胡進潔的一次特別經歷 —— 當他準備翻譯一卷福音書為哈薩克語（Kazak，因他在北疆，哈薩克人居住在北疆）時，他知道曾有一個俄國人翻譯過。奇妙地，他竟在一巴扎（集市）得到這譯本（"a Gospel in the Qazaq tongue, but written in the Russian script"，以俄羅斯文字音譯的哈薩克語福音書），以致他可以借助一毛拉（mullah，伊斯蘭教學者或教職稱謂）的幫助，開始翻譯一本哈薩克文字的福音書。[59] 當馬爾昌來到新疆與胡進潔同工時，也像他一樣，一方面在語言上努力學習，一方面在翻譯上付出心力。[60] 在新疆傳教的建基期，學語言以至傳道，以及翻譯是必須的，這些都不是短期能夠速成的。

兩位傳教士在新疆傳道的對象是穆斯林，故此，傳教方法就會針對對象而立，因而也在裝備上花了不少時間。除了學習當地不同民族語言，以他們的語言翻譯聖經外，也要認識他們的宗教。胡進潔也翻譯了

---

[57] W. N. B., "Our Book Tabl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9, 469.

[58]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9)：提到馬爾昌列出七種語言聖經釋本的需要，其中包括柯爾克孜語，而《中華歸主》又提到他們賣俄語聖經（因1917年俄國革命，俄國來的難民委實不少）；蒙古語又有不同部落的需要，馬氏譯了一本西蒙古－加爾麻語字典；此外，按馬氏完成的翻譯，有塔塔爾語詞典。

[59] Cable and French, *George Hunter*, 56.

[60] 張陳一萍等編：《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惟獨基督》（*Christ Alone: A Pictorial Presentation of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5），頁141；黃錫培：《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Petaluma：美國中信，2006），頁33。

一本新疆突厥族人的神學著作*Mohammedan Narratives of the Prophets*，內容有七十一篇文章，內容包括創造、先知生平，及其跟隨者的事蹟。有負擔向穆斯林傳道的人可藉它學突厥語，也可透過閱讀它去明白哈薩克人的宗教思想和感情。[61] 1939年，《億萬華民》提到穆斯林事工的裝備時說，傳教士要在本身的國家或印度先學習，也要跟隨地方全時間同工學習。[62] 要承擔穆斯林事工就需要接受語言和專門知識的訓練。

丙　政治 —— 在政治不明朗或動盪期，傳教事業隨時受限或結束

中國土耳其斯坦，不僅面對強鄰俄國和英國殖民地勢力的威赫，內部又有民族分裂戰事的問題。十九世紀後期，1862年起，有陝甘回族反清以及新疆回族和維吾爾族聯合反清；1865年，更引來境外中亞地區的浩罕汗國軍官阿古柏入侵，[63] 直至1881年清軍才收復並統一它。[64] 1884年，清朝政府建新疆省。進行了政治上的改革，包括廢除伯克（突厥語是首領，指官職）世襲制度（哈密和吐魯番的王公貴族仍實行世

---

[61] Cable and French, *George Hunter*, 58; J. D., "One Book Table: *Examples of the Various Turki Dialects with Turki Text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Mohammedan Narratives of the Prophets, Turki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 W. Hunter,"*The Chinese Recorder*, June 1920, 427-28.

[62] "MoslemWork," Minutes of Council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on 3 January 1939, 21 (463).

[63] 十九世紀後期，隨着太平天國反清事件發生後，回民反清也發生於陝甘一帶以及新疆：（1）以金積堡為中心，以馬化龍為領導的根據地；（2）以河州為中心，以馬占鰲為領導的根據地；（3）以西寧為中心，有馬文義、馬桂源和馬本源為領導的根據地；（4）以肅州為中心，以馬文祿為領導的根據地；以及（5）新疆的回族與維吾爾人聯合。1864年，由庫車開始，漫延至天山南北，包括烏魯木齊、和田、喀什噶爾及伊犁。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銀川：寧夏人民，1996），頁237、263～264。

[64] 1877年打敗阿古柏，收復南疆、烏魯木齊等全部失地；1881年從沙俄收復伊犁。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269～270。

襲，而哈密王的世襲要至1930年他病故時才結束），[65] 授命巡撫管理，建省後第一任巡撫為劉錦棠。

二十世紀初，新疆主要由地區軍閥掌政。1911年，楊增新被袁世凱任命為都督。民國後，1912年改任省主席，1928年被刺身亡。他任職省主席期間，面對沙俄影響下的蒙古自治（1911-1917年，其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面對1917年俄國革命並逃入新疆的俄國難民，之後在蘇俄影響下的蒙古獨立（1921年）和建國（1924年）。他一方面要防備英國、蘇聯的窺覬，一方面又要面對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傳播。他的防範策略包括：（1）為防往麥加朝覲回來的哈吉帶回新思想、新知識，於是限制朝覲的人數；（2）嚴禁私聘外國人來新疆作阿訇教導穆民的工作；（3）禁止外國人在新疆私設學校（筆注：外國人，主要指土耳其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屬敵國）。此外，為防止教爭、保持施政地方安寧，也訂立以下規則：（1）禁止毛拉、阿訇越區傳經佈道，尤其是從甘肅、青海各省來的；[66]（2）不准另立教派；（3）只准在清真寺禮拜；（4）不准穆民念《古蘭經》、《聖訓》以外的經典；（5）小心選擇阿訇，以起對穆民開導作用；（6）提升阿訇的社會地位，不容人更換或侮辱阿訇、蔑視伊斯蘭教。並且讓他們在民事案件中協助辦理。[67] 1923年，發表《密令各屬毋蔑視纏回宗教》，以宗教有利社會安定。若穆民篤信宗教，尊重阿訇，那麼

---

[65] 《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編寫組：《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第二冊，頁150；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372。

[66] 不過，仍有甘肅的阿訇入疆帶來影響，如馬良駿（1913年）、馬萬福（1914年）。

[67] 《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編寫組：《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第二冊，頁218～219。

阿訇的勸導就能對統治的秩序有良好的影響。[68] 楊增新的做法封建專制、愚民，但在當時算是帶來暫時的安定。從當時來此地替假的傳教士胡立禮（H. F. Ridley，1862-1944年）的評語「人民對統治者的死深表遺憾，因為他對他們很好」看來，新疆人民是接納楊增新的領導。[69] 余振貴也承認楊的施政能對穩定社會起積極的作用。[70] 在楊的治理下，地方阿訇的宗教權威得到維繫甚至提升，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卻缺乏教外的知識，這或許是傳教士翻譯的聖經和基督教書籍被接受的原因。

1928年，金樹仁任省主席，一直至1933年。三十年代初，民族矛盾已到極度尖銳化的地步，最後盛世才政變成功，成為新一任省主席。究竟甚麼導致金樹仁垮台呢？余振貴提出以下原因：在軍事上擴充以致增加軍費。軍隊由楊增新時期的三個師增至六個師。以前楊是以回守回，現在金則不信任「新疆回隊」。在用人上，金惟親是用，更未能有力整治軍隊，這樣不受紀律的軍隊對人民是苦難的根源。軍費由1927年至1932年增加了4.4倍。支出和收入不平衡，以致大量虧空，經濟加劇惡化。官員腐敗，勒索受賄；政府苛捐雜稅，只顧聚斂；民怨沸騰，而金樹仁領導的省政府只知殘酷鎮壓。因此1931年的哈密事變，牽涉了漢回民族的衝突，因苛捐重稅受壓的農民，要復辟王制的野心王公貴族，並退役新疆回隊的發難等，引來了第四次河湟事變（1928-1931年蔓延至新疆）的領導人馬仲英（十八歲，人稱「尕司令」，帶領二萬五千

---

[68]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348～366。

[69] "News from Sinkiang," *Friends of Mslem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3:1 (January 1929): 7; "A letter has just come to us from Mr. French Ridley in Tihua, Sinkiang… 'The Governor's death is much regretted by the people, for he was very good to them….'"

[70]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349～350。

人）[71] 轉戰新疆。事緣哈密叛亂的農民往甘肅尋外援，正值馬仲英在肅州敗走。[72] 馬氏於1931、1933年兩番圍哈密，1932、1933年圍迪化，1933年相繼攻佔鄯善、吐魯番、木壘河。最終馬仲英被盛世才打敗，退戰南疆，盛世才此時也像其他軍閥般展開反金政變。[73] 民族分裂仍不斷蔓延，如1933年4月成立和田伊斯蘭政府，1933年11月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包括阿勒泰、塔城、伊犁、哈密、莎車）。

盛世才成功在新疆當政後，就採取親蘇立場。1933至1934年間，他與蘇聯軍隊徹底打敗馬仲英，結束新疆戰亂。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開始，日本的侵華勢力進駐蒙疆。[74] 與此同時，新疆地方軍閥再次叛亂，首先是喀什噶爾的麻木提，然後是平亂的馬虎山也叛亂，都被平息。此時盛世才欲靠攏國民政府，借口有蘇聯支持的陰謀暴動，與蘇聯決裂，再在新疆各地對異己進行大逮捕。[75] 1938年，他下令驅逐新疆全境傳教士出境。[76] 瑞宣教會的傳教事業雖已建立得較有規模，也與內地會的一同被禁止。

在1937至1944年間的後期，盛世才又想轉回馬烈主義，1944年終被國民政府調離新疆，結束他在新疆十二年封建軍閥政權。

---

[71] " Moslem Rebellion in Kansu," *Friends of Moslems* 3:3 (July 1929): 9.

[72] 《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編寫組：《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第二冊，頁312。

[73]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367～376、383。

[74]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425。

[75] 《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編寫組：《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第二冊，頁321～323；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392～393。

[76] 徐永志：《熔融與衝突 —— 清末民間邊疆少數民族與基督教宗教研究》（北京：民族，2003），頁204。

（二）二十世紀初內地會在新疆傳道的進展

二十年代及以前，新疆主要有兩位傳教士 —— 胡進潔和馬爾昌，[77] 胡進潔於1906年開始在新疆傳道，時年四十四歲；馬爾昌於1914年加入，時年三十二歲，胡進潔已獨自在迪化工作了八年（年屆五十二歲）；另一位胡立禮於1926年 —— 當馬爾昌準備回英休假時 —— 從甘肅往新疆幫助胡進潔。他與胡進潔同齡，時年六十四歲，之後留下直至1932年才退休回國。[78]

「三婦女」（馮貴珠、蓋羣英及馮貴石）自1923年始也加入新疆傳道，主要是穿越甘肅和新疆中間的戈壁沙漠，以旅行傳道方式接觸遊牧民族的婦女。她們因休假之事過境或因傳道旅程進入新疆時，也曾到迪化、古城等福音站探訪內地會同工，並向當地穆斯林婦女傳道。[79] 她們於1923年申請入新疆傳道，過程並不容易。因為她們不僅是女性，並且年紀也不小，在體力上比不起年小輕小伙子 —— 馮貴珠和馮貴石均超過五十歲，而蓋羣英四十六歲，比胡進潔入新疆傳道時（1906年時四十四歲）年紀更大。她們開始申請時向差會這樣問：

---

[77] 胡進潔在Hunter,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296：提到多年前蘭醫生（Dr. Lansdell）和巴格道（又名巴僑治，George Parker，1876-1931年）曾於新疆東部旅行及派發短篇聖經。1907年，有英國聖經公會的代理人員竇齡漢（Hans Doring）也曾參與派發聖經和旅行佈道一段時間，但都沒有建立任何成果。參W. N. B., "Our Book Tabl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9, 469. 此外，當巴格道去世時，也記錄他曾在新疆工作。"Rev. George Parker," *Minute of Council Meeting Held at Newington Green on 9 September 1931*, 359.

[78] James Stark, "Our Shanghai Letter," *China's Millions*, September 1927, 118; "Mr. Mather's Safe Arrival at Tihwafu," *China's Millions*, January 1929, 13.

[79] Mildred Cable,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Asia: Address at the C.I.M. Annual Meetings in Queen's Hall," *China's Millions*, July 1927, 101.

> 有經驗的中年傳教士、能說漢語的，對西北的情況是否有用呢？還是沒有經驗的年輕人但有更好的體力，更肯定地需要呢？[80]

她們的申請共等了十二個月才得批准，[81] 可想像其中經過相當激烈的討論。

這段時期，新疆傳道遇上最直接和最明顯的問題莫過於同工缺乏和政治動盪兩大問題。按傳教士人手情況可將這段時期分為二：一為傳道先鋒在新疆傳道的建基和撒種期（1906-1932年），一為後繼者在新疆傳道的延續和推展事工期（1932-1938年）。建基和撒種期主要面對的政治因素是俄國革命帶來的政治局勢不穩；而延續和推展事工期主要面對的政治因素則是穆民在新疆發動的事變、地方軍閥的腐敗，以及傳教士生活在當地政治勢力與蘇聯的不明朗關係下。

甲　傳道先鋒在新疆傳道的建基和撒種期（1906-1932年）

同工缺乏是新疆傳道工作在這時期面對的困難。

胡進潔開始新疆傳道事業時獨自服侍了八年，可見同工難求。當馬爾昌感召而寫信詢問他時，他就將事工的困難情況毫不隱藏的說出來，讓馬確實的考慮，而馬在開始服侍後也真實的經歷到那些困難。當馬爾昌面對孤立、孤寂的傳道生活時，曾有朋友提議他娶妻以得同伴；但他顧慮到環境情況對配偶的不利就放棄了結婚的想法。他曾在信中對他的母親說：

---

[80]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Something Happened*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Limited, 1933), 122-23. 參黑尼亞提：〈近現代新疆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研究〉，40～41。

[81] Cable and French, *Something Happened*, 123-24.

> 媽媽，我永不會犯上娶妻子這錯誤，因這會將她帶進中亞現存的這種情況之中。[82]

其實，不僅是馬爾昌，胡進潔也一直保持單身。並且自入新疆後，一直到離世（四十四至八十二歲），再沒有休過假。他的同工馬爾昌自入新疆後，也要到十二年後（1926年，事實上是他入中國十六年後）才安排到休假，極不容易。他於1920年對延期休假表示：

> 日子短暫，充滿的是惡，千萬未聞耶穌名字的人正在滅亡。[83]

馬爾昌對新疆福音事工的委身確是毫無保留的。從1926年內地會在上海的會議記錄可見：

> 過去，曾多次寫信給馬爾昌，詢問他休假的事。但他拒絕了，說他的健康沒有問題。[84]

那時胡進潔已在新疆事奉了二十年，時年六十四歲；而在馬休假時，只安排了胡立禮這位「老」朋友來幫忙。老傳教士到新疆來替假，叫人不禁問，為甚麼甘肅不來個年輕的呢？當胡立禮死時，悼念他的蓋羣英提起胡的說話：

> 那些年輕人不為這工作前來，所以責任就落在我身上，由我去做了。[85]

---

[82]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Percy Mather of Central Asi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5), 76.

[83]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96.

[84] The China Council, "One Hundred and Fortieth Session: Minutes of Council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on March 11, 1926," 2 (Microfilm, 275).

[85] A. Mildred Cable, "In Memoriam: Rev. H. French Ridley," *China's Millions*, May-June 1944, 23.

當馬爾昌準備回英休假時，自1923年請纓入戈壁沙漠傳道的「三婦女」也同時一起回英述職，她們也往迪化與馬爾昌會合。蓋羣英等在*The Making of a Pioneer*這樣描述：

> 現今距離兩位男士見到自己同鄉的女士有十二年了，故此他們為她們預備一個盛大的歡迎。[86]

可見在迪化難得見到同鄉，而女同鄉更難得見到。事實上，他們是連自己的同工都難得一見，「三婦女」雖也在新疆服侍，但與迪化的團隊不算有甚麼聯繫。

馬爾昌休假後再回新疆，他的表達令人更感受到新疆工場的困難。雖然他以遵行神旨為首要的精神，實在可嘉，但仍掩蓋不了當中離開家人的無奈和不捨。馬爾昌在他述職期間的分享中不止一次表示：

> 我回去不是因為我很想回去，更容易是留下來與我所愛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我回去不是因為我愛中國人或是中亞的人民。我相信，對我來說這是上帝的旨意。我的神啊！我喜悅照祢的旨意去做。[87]

總而言之，新疆的生活環境委實不易，傳教士連婚姻也不敢奢望。傳教士面對外在環境需要體力應付，但更困難的是心靈面對的孤寂。

---

[86]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206.

[87]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213, 219. 胡立禮的姪Patrick Miles有感而發："Nor should we underestimate how difficult it must have been to leave a growing church to go to a place where he would have to start the whole process again of building up the church from virtually nothing." Patrick Miles, "My Great Great-uncle Missionary to China," OMF International: Prayer Point,< http://www.omf.org/omf/us/resources_1/ newsletters/china_insight_newsletter/china_insight_2--1_2005/may_June_2002/ >(accessed 21 November 2012)。

1. 建基 —— 文字事業

新疆先鋒傳教士的基督教事業主要為三方面：翻譯聖經、售賣不同語言譯本聖經和基督教書籍，以及傳道。

a. 聖經翻譯 —— 準備向不同民族傳道

《中華歸主》記載了1920年及以前在新疆售書的記錄：

> G. W. Hunter在遊行佈道時售出與分送的聖書計有：漢文《福音》326冊，《創世記》4冊，《聖教問答》25冊，葛薩《福音》57冊，《亞伯拉罕之土耳其生活記》5冊，土耳其文《創世記》5冊，土耳其文《撒母耳記》10冊，土耳其文短篇經文90冊，滿文《福音書》12冊，蒙文《福音書》29冊，加爾麻文(Kalmut)《福音書》2冊，藏文《福音書》24冊，俄文《福音書》一冊，此外尚有漢、蒙、藏及東安文字之宗教要義亦多。[88]

以上的資料告訴我們，這時期兩位傳教士手上已有不同語言的聖經譯本，包括漢語、突厥語、蒙古語、加爾麻語、滿洲語、藏語，還有俄語。這些出售的聖經可以是從英國聖經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所得來的別人的譯本，如漢語、滿洲語。[89] 不過，哈薩克語的《福音書》和加爾麻語的《福音書》卻必然是胡進潔[90] 和馬爾昌分別為北疆傳道作準備而翻譯的成果。1934年，朱佩儒報告工場消息

---

[88] 中國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上卷，頁679。

[89] Cable and French, *George Hunter*, 56. 漢語譯本早已作成，而滿洲語福音書也早為在滿洲傳道而翻譯了。

[90] 胡進潔在翻譯上完成一本哈薩克字體的福音書譯本，並不在上列，大概在調查以後完成。

時，提到胡進潔正努力翻譯新版本的突厥語新約聖經，因舊版本中仍存有太多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使人難明。[91]

b. 翻譯不同語文的教科書和工具書 —— 訓練在職宣教士

除了翻譯聖經外，他們有另一方面的成果。胡進潔為後繼的傳教士在學習突厥語和伊斯蘭教知識上翻譯了兩本書：*Examples of the Various Turki Dialects with Turki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和 *Mohammedan Narratives of the Prophets, Turki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92] 而馬爾昌在翻譯上完成了三本著作：《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蒙古文教科書》（*Mongolian Text Book*）和《滿洲字典與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另外三本於1931年完成：一本滿洲和蒙古成語小手冊、一本塔塔爾字典及一本西蒙古字典，[93] 都屬於蒙古語和滿洲語訓練的課本。胡進潔、馬爾昌的語言課本和工具書都是為後來的傳教士所預備的。他倆的身分不僅是傳教士，也是工場上在職傳教士的老師。

---

[91] W. F. Drew, "News from the Field: Manass, Sinkiang,"*Friends of Moslems* 9:1 (January 1935): 13. 胡進潔也這樣說，他提到以前助他翻譯的的說突厥語的毛拉遷到別城。J. W. Hunter, "News from the Field: Chuguchak,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9:3 (July 1935): 49.

[92] Mohammedan Narratives of the Prophet是在胡進潔傳道早期翻譯的。Cable and French, *George Hunter*, 58.

[93]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272. 日記記載的五本書是：一本滿洲文法、一本滿洲字典、一本滿洲和蒙古成語小手冊、一本塔塔爾字典和一本西蒙古字典。相信三本巨者是存留下來的；而日記提到的首二本為巨著之一，其餘則是另外翻譯的成果，可能沒有保存下來了。

c. 撰寫文章、日記、工場報告 —— 動員後繼者及準備承繼事工

胡進潔著述的文章[94] 或馬爾章所寫的日記，[95] 以及他們寫的工場報告，[96] 都詳細記錄了新疆工場的知識。胡進潔的文章不但能幫助對穆斯林工作有負擔的人得到有關知識，也叫讀者受感動而投身這傳道工場，他的同工馬爾昌就是其中一個好例子。他在讀一本書：《宣教方式 —— 保羅的或是我們的》（Roland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時有所領受，然後讀胡的文章，感到兩者的關連，遂決定以前者傳福音的實用原則，應用在新疆的傳道旅程上。他就是這樣確定中國土耳其斯坦傳道旅程的呼召。[97]

2. 撒種 —— 售書和傳道事業

售書和傳道工作是否順利，政治情況是一個重要因素。

a. 由政治平穩至邊陲政治緊張時期（1906-1928年）

胡進潔入疆傳道時，瑞宣教會早自1890年代起，率先進入新疆喀什噶爾，並且以此為他們的基督教事業集中地。他們依次擴展至疏附

---

[94] 胡進潔的文章散布在*The Muslim World, The Chinese Recorder, the Quarterl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 in China*和the *China's Millions*，以及著述。其中如Hunter,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292-97：介紹新疆一般情況，包括地理、天氣、道路、民族、鄰近的突厥族人所在、人口、傳道事業；Hunter, "Contributed Articles — In Chinese Turkestan," 511-16：介紹新疆的不同民族；G. W. Hunter, "Turki People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Chinese Recorder*, 1920, 556-58：單單介紹一個主要民族 —— 纏回，即維吾爾族； "The Chinese Mslems of Turestan," *The Muslim World* 10: 2 (April 1920): 168-71：介紹另一民族 —— 東干人，即漢回。

[95] 即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一個捨己為人、有血有肉的傳教士傳記。

[96] 如H. French Ridley, "In the City of Tihwa: My First Report from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China's Millions*, February, 1928, 26-27，給予過去工場傳道歷史。

[97]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73-75.

（1892年）及莎車府（1895年；疏勒府〔1909年〕和英吉沙〔1912年〕是於胡入新疆後才建立的），這些城市彼此都很接近。瑞宣教會在建立基督教事業上，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革命之前已把握了時機。

胡進潔首先往南疆喀什噶爾學習突厥語，又在北疆遊牧民族中生活，學習蒙古語和哈薩克語。他一方面在迪化設福音站傳道，[98] 一方面走進遊牧民族的生活中，在山上紮營，旅行傳道。他採取邊傳邊學語言的策略，這也是最奏效的。他也研究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以致歸納所見：1910年他已提到，在向穆斯林傳福音的經歷中，以接觸維吾爾族（纏頭）是最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宗教領袖毛拉都反對福音。故此，胡進潔勸喻向穆斯林傳道的人不可灰心。[99] 後來的馬爾昌也曾被纏頭回人的毛拉公開並當面燒毀從他買來的福音單張。[100] 當胡進潔於1920年再提到維族人時仍是說，他們撕爛或燒毀福音書和單張，也阻止別人讀聖經。[101] 至於東干人，雖然他們喜歡辯論，但只是喜歡展示知識，並且算是有禮貌。賣書方面，哈薩克人願意買書，在還沒有他們本身民族語言哈薩克語的《福音書》前，他們仍願意購買突厥語的《福音書》。[102]

當馬爾昌於1914年加入成為胡進潔在新疆的同工後，胡已經在省府工作了八年。馬氏述說胡氏與迪化人民的關係：

> 當傳道的時候，人們都非常留心，我不用拉小提琴已有很多人到這裏來（筆注：福音堂〔a chapel〕）聚集，有些站兩三個鐘

---

[98] 1910年有福音堂；1914年兩位傳教士在迪化也建了屋居住。Hunter, "Contributed Articles — In Chinese Turkestan," 511;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11.

[99] Hunter, "Contributed Articles — In Chinese Turkestan," 512.

[100]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31-32.

[101] Hunter, "Turki People of Chinese Turkestan," 558.

[102] Hunter, "Contributed Articles — In Chinese Turkestan," 514.

> 頭。胡進潔先生在此鎮有美名，被人認識，被人尊重。在這裏維繫教會（a church）是很困難的，因為人們多數不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103]

胡進潔在迪化的八年，得了美名，被人認識，被人尊重。

論到1914年後在不同民族中的傳道工作，最突顯的莫過於馬爾昌在蒙古人中間的事工。1915年起，馬爾昌就與蒙古人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在蒙古人紮營的地方，馬爾昌常去探訪他們。他為了學蒙古語，甚至去探訪一位坐牢的蒙古人，竭力用不多的字句與他溝通。他又得到一個蒙古男孩為他工作，以致他有機會從那蒙古男孩中學說流暢的蒙古語。馬氏常能在每個星期日的黃昏，在蒙古人中間傳講福音，還有蒙古人作他的翻譯呢！[104] 雖然如此，蒙古人受喇嘛教影響很深，馬爾昌在他的信中請求人為蒙古人的屬靈情況代禱。[105] 馬爾昌在接觸蒙古人時，他也以簡單的醫療知識幫助他們，包括護理一位蒙古老人的眼；若遇見不同民族有需要，如消化不良、膿腫、腳部骨折、被野獸咬傷，甚至吞食鴉片自殺等，他都盡力按書本上簡單的急救常識幫助他們。[106] 可是他來中國以前是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只是面對需要，不得不勉力去應付。

他在遊牧民族中，不僅與所遇見的蒙古人融洽相處，與其他民族，如哈薩克人和滿洲人，也是如此；他也能向他們傳道。當賣書給他們時，書籍一般都是被接受的，甚至會售罄。[107] 不過，接觸維吾爾族

---

[103]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07.

[104]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53-57.

[105]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77.

[106]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54, 178-79, 185, 201-2.

[107]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92-95, 234, 239, 241.

是真有困難的，他們的毛拉是反對福音的領頭者，行動大致限於拒絕購買、撕爛或燒毀書籍。

1917年俄國革命後，很多難民湧過新疆來，把一本俄蒙字典從俄國帶到迪化，最終讓馬爾昌買了它。沒有課本和工具書學蒙古語的經驗，驅使他看見翻譯字典和文法書的重要，能幫助以後學蒙古語的人。此時，信件因着在迪化有不同民族混雜而受到審查，兩位傳教士寫信時都小心翼翼，不敢牽涉任何政治議題；在迪化的公眾地方也禁止任何政治討論。自這時開始，一直至1926年，兩位傳教士都只能專注於翻譯工作和長時間的旅行傳道。

> 兩位男士交替使用這段時間在延長的傳道旅程上和在深入的語言研究及翻譯工作上，一直至1926年。[108]

胡進潔一直努力翻譯突厥語和哈薩克語書籍，而馬爾昌此時則把所有時間都投放在翻譯英蒙字典上。

胡氏和馬氏不僅把握時間翻譯，也探索不同的傳道旅程，向東到古城（Kucheng）和木壘河（Muhleiho）；向西北到阿爾泰（Altai）、塔城（Tahcheng，即Chuguchak）和伊犁（Ili）；向南到焉耆（Karashar）和吐魯番（Turfan）等。[109]

當胡進潔送馬爾昌回英休假後，他送他一直到塔城 —— 哈薩克族人的所在地，在馬和「三婦女」走後，他就在那裏賣書和傳道，算是胡氏那年的第二次旅行佈道。[110] 這次遇到說突厥語的土庫曼人，從他

---

[108]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83.

[109]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85.

[110] Ridley, "In the City of Tihwa: My First Report from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China's Millions*, February 1928, 27. 第一次以兩個月時間探訪了喀喇沙爾(Karasher，即焉耆)。

們的一段對話，能看到胡氏過去（當時是二十二年〔1906-1928〕的事奉）在新疆的影響。

「他是不是那個破壞我們宗教的人？」

「是的，就是那人。」

胡進潔又探訪伊犂，即是滿洲人和哈薩克族人聚居地，反應不錯，賣了不少書，甚至有人要求郵遞買書；而佈道時人們都留心聽，可算是一個禾場。胡立禮表示，若能派人進駐當地，他就不用這樣長途旅行了。[111] 可見佈道人手缺乏，致未能建新福音站，而傳教士也花了不少時間在旅途上。

1927年，當馬爾昌休假時，他因看見新疆工場在醫療方面的需要，前往眼科醫院、牙科醫院及骨科醫院學習（犧牲了與家人相聚的寶貴時間）。[112] 事實上，不僅馬爾昌，胡進潔也同樣努力，他們無論在迪化，或在旅行途上，都以藥物幫助有需要的病人，這成為他們在新疆常規的服侍。當馬爾昌休假回來，在每主日崇拜後，他都要看八十個病人呢！[113]

之後，當馬爾昌的英蒙字典付梓後，他就展開翻譯滿洲語字典和文法書，[114] 這也可算在他離世前要完成的重要工作。為要接近一個有

---

[111] Ridley, "In the City of Tihwa," 27.

[112]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213-15.

[113]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201; 232-33. 當馬爾昌休假回來，蒙苦人聽見就立即來尋找他幫忙醫治，在每星期日崇拜後，他就要忙於醫治來求診的人。

[114]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243; "From Sinkiang," *China's Millions*, June 1931, 109.

能力幫助他翻譯的俄國朋友，他獨自搬到塔城，開新福音站，留在那裏翻譯直至完成為止。

胡立禮於1928年撰寫他的第一份迪化事工報告時呈報了新的發展：

> 剛在他（注：胡立禮）來到以前，一所新教堂（a new church）已經建成，它能容納大約200人，星期日的會眾平均約65至70人。[115]

這份報告主要讓我們知道在迪化有了新的固定傳道地方，並且有了固定的人來聽道和詢問信仰的問題，這並不表示加入教會的人數有了突破。胡進潔和馬爾昌兩位傳教士都很少提及人們信主和受浸的情況，筆者只從資料中讀到他們於1922年往迪化東部的木壘河探訪兩位基督徒兄弟和一位退役的基督徒士兵，而當時與他們同行的是一個由伊斯蘭教改信基督教的男青年。[116] 在木壘河的兩位弟兄曾於1937至1938年去信在奇台傳道的石愛樂和趙立德，提起他們是於1908年由胡進潔施洗的，[117] 改信的男青年則屬於兩位傳教士共事時候的福音果子。胡立禮在報告記載的主要是一些對福音有興趣的人，其中有漢人、東干人、突厥族人及很多學生。他特別對學生的福音工作有負擔，因為他喜歡接觸孩童，在他以前服侍的蘭州和西寧都開設了學校。[118]

---

[115] Ridley, "In the City of Tihwa," 26.

[116] Cable and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196-98. 青年人於六年前在木壘河買了福音書和單張，之後與傳教士不斷討論信仰，今已他由伊斯教轉信了基督教，回到木壘河時竟勇敢地往以前學習過的清真寺作見證。

[117] 黃錫培：《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頁65。

[118] Ridley, "In the City of Tihwa," 26.

馬爾昌留在新疆塔城一年多後，於1931年11月6日寫了一封信報告他的翻譯事工及與當地人接觸的情況，其中提到當地的哈薩克人——貧窮但誠實，喜歡社交和非常友善，常來找馬爾昌看病。[119] 馬爾昌與他們的接觸並沒有出現文化衝突。

b. 第四次河湟事變並蔓延至新疆時期（1928-1932年）

1927年國共分裂；1928年河湟第四次事變又發生，回族騷亂漸劇。同時，新疆省主席楊增新被刺，繼任者為金樹仁。全國、鄰近地區至新疆本土都政治動盪，但胡立禮仍表示，新疆在中國來說是比較和平的地方，仍容許傳道；[120] 這或許就是他一直至退休都沒有回甘肅的其中緣故。[121]

胡立禮以往在甘肅的傳道贏得漢回的感激。不過，1929年他在吐魯番的經歷就不同了；不僅異於胡進潔和馬爾昌過去在新疆的經歷，也與胡立禮過去三十八年的經歷不同，對一位老人家來說真的不容易。他形容這是「一次新的經驗」、「在過去三十八年來從來沒有穆斯林如此騷擾我」。他兩次遇到吐魯番的人燒福音書和單張；當他傳道時，還有人在叫囂、喝倒彩，並不斷投擲泥塊和爛水果。一次在吐魯番的南邊小鎮Lukehen，纏頭（維族）伊斯蘭教學生煽動騷亂，後來有一個士兵來保護他回客棧。[122] 一次在吐魯番西門外，也有一個纏頭的阿訇引發動亂，後有官員帶同四個士兵來查問並保護他離開。[123]

---

[119] "In Far Sinkiang: A Letter from Mr. Percy Mather, Dated November 6th, 1931," *China's Millions*, February 1932, 24.

[120] Ridley, "In the City of Tihwa," 27.

[121] 1926年，甘肅的胡立禮（H. F. Ridley）原計劃到新疆是一兩年期，但至終卻服侍至1932年。

[122] "News from the Field: Tihua (Urumstsi)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3: 4 (1 October 1929): 7-8.

[123] "News from the Field: Tihua (Urumtsi) Sinkiang," 7.

余振貴在《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也提到金樹仁為防止教爭，曾嚴禁基督教會向穆斯林傳播的政策，之後更以密令給各地地區的行政長官並密諭阿訇跟進，記載如下：

> 1931年，迪化福音堂向各縣寄送攻擊伊斯蘭教法不良，鼓吹耶穌教法甚好，煽動回教人民皈依耶穌教的維吾爾文及哈薩克文傳教書刊。金樹仁得知後，立即向塔城、伊犁、和田、迪化、喀什、阿山地區的行政長官發出密令，指出新疆多數民眾 "俱係回教教民，而其人民又好起教爭。老教與新教爭鬥，又與新新教鬥，以一聖相傳之教，於一種相承之教，尚且因爭教而時起衝突。今福音堂欲以耶教煽惑回教，使之逃墨歸楊，將來爭教隱患正未堪以設想"。逐（注：遂） "密令該行政長轉飭所屬各有福音堂暨外國人設學堂之各縣，其教師之授受暨教徒之傳播如有犯上項煽惑引誘各情，立即嚴行查禁。並密諭各阿洪（注：阿訇）一體嚴為防範，期彌隱患而保治安"。[124]

內地會傳教士一直都是售買書刊的，不是寄送；若寄發也是傳教士寄予旅行中的傳教士補給而已。政府是否在審查書信時發現這補給的情況？究竟金樹仁為甚麼要於1931年才向那麼多地區的政府官員傳密令呢？看來，這與當時哈密事變至河湟回族騷亂蔓延的環境因素有關，想是防範添亂罷了。不過，金樹仁的信件卻成為一種煽動，不僅使地方官員嚴禁傳教，也驅使伊斯蘭教領袖與傳教士為難，不容他們在他們的地區傳教。

面對人力缺乏的實況，傳教士們仍勉力在語言訓練上作好預備，並且在擴展傳教地域上探索，等待人力改善的時機。不過，迪化面對的

---

[124] 余振貴：《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頁370。他的資料來源：白振聲等：《新疆現代政治社會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2）。

政治動盪卻是一浪接一浪，1917年俄國革命，1921年、1924年蒙古在蘇俄影響下獨立至建國；1928至1931年，第四次河湟事變蔓延至新疆。從地理上看來，迪化首當其衝，迪化的福音事業也被殃及。

乙　後繼者承接和發展事工期（1932-1938）

新疆於1929年被視為其中未完成使命的一省，福音工作還不怎麼算開始，需要招募人手。[125] 因此當中國內地會呼召二百人時，其中六個就成為偏遠的新疆省的新力軍。胡立禮在事工報告上這樣寫：「我們聽見新招募的人手正在往這長久被忽視的省份的途中，要在很多未得之城得着一些。」[126] 可惜的是，新疆此時又面對回族騷亂，而年約七十一歲的胡進潔牧師正自上海接六名新的年輕傳教士同工到來。

1. 承接期：三十年代初增傳教士新力軍卻痛失兩員

a. 來華是為了傳道

被差派來的年輕傳教士包括：巴富羲（Emil Fischbacher，1903-1933年，被中國內地會接納宣教士申請時是28.6歲）、石愛樂（Otto Frederick Schoerner， 1906-2008年；美籍傳教士，被接納申請時25歲）、[127] 趙立德（Raymond H. Joyce，約1909-1992年，被接納申請時22.3歲）、何仁志（George F. Holmes，約於1911年生，被接納申請時20.7歲，還需要他爸爸寫一封表示同意的信）、[128] 朱佩儒（William

[125] "Unfinished Task," *China's Millions*, February 1929, 20.

[126] "A Rapid Survey," *China's Millions*, June 1929, 87.

[127] "Papers of Otto Frederick Schoerner," Billy Graham Center Archives, <http://www2.wheaton.edu/ bgc/archives/GUIDES/055.htm> (accessed 10 June 2013).

[128] "The Raymond Joyce Memorial Library, " under construction, <http://ffmna.org/library.html> (accessed 10 June 2013).

J. Drew，約於1909生，被接納申請時22歲）[129] 及柏愛生（Aubrey F. Parsons，澳大利亞籍傳教士）。除了石愛樂和柏愛生之外，其餘的都是英籍傳教士。以下是其中五位成為到中國來的宣教士的經歷。

巴富羲醫生出生於英國格拉斯哥，在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學醫，成為內外全科註冊醫生。他的姊姊（巴若蘭，Elizabeth Fishchbacher）和小弟（巴輔勝，Theodore Fischbacher）都是內地會的傳教士。姊姊是家中第一個傳教士，而弟弟則在巴醫生死後才藉此蒙召到中國來。巴醫生是如何奉獻的呢？巴富羲早於十二歲時就想過做宣教士，但到他長大成為醫生後，只一心行醫。直至他讀了《億萬華民》的〈「致青年人」的一封公開信〉("Open letter to young people")受感召，認定要申請加入內地會到中國來。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 我們用了差不多兩年時間呼喚二百位新傳教士加入，但沒有達到目標。對這個呼喚，你有甚麼回應呢？或許你曾經因不同的原因拒絕回應，但你有沒有考慮到，若繼續拒絕回應，你在主再來的日子能夠對主怎樣解釋呢？[130]

他同時也讀到以弗書三章7、8節，明白傳福音給外邦人的召命是神對他的大恩賜（God's great "gift" to me)。[131] 於是他就成為二百位傳教士之一員，並寫下他的見證：

---

[129] *Minutes of the China Council*, 1931; "Reinforcements," *China's Millions*, October 1931, 184-86; December 1931, 225-26; "A Second Valedictory Meeting: The Last Party of the 'Two Hundred,'" *China's Millions*, January 1932, 13-14.

[130] "For almost two years we have appealed for 200 new missionaries without reaching our goal. What is your response to this call? Perhaps you have resisted it for different reasons, but have you considered what you will say to the Lord on the day of his return if you continue to resist?" "Emil Fischbacher,"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available from <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 f/fischbacher-emil.php>(accessed 23 May 2013).

[131] "Reinforcements," *China's Millions*, December 1931, 225.

> 我一直反來覆去思想這問題：「究竟我讀醫是為了傳福音？還是做醫生呢？當我看見《億萬華民》今年六月號的委身中國宣教事工的呼喚，我的心一直受到感動不已，以致沒有甚麼能使我不去的了。」[132]

他來華的目的是為了傳福音。

巴醫生於1931年被內地會接納為傳教士，為二百人中最後一批於1932年2月1日到達中國上海的，卻遇着「一二八事件」（上海抗日戰事）而未能如期上岸並參加在安徽安慶語言學校（The Anqing Language School）舉行的語言訓練班。之後由水路經長江前往，只接受了短期（兩個月）語言訓練，便要與其他五位新傳教士起程赴新疆了。[133]

石愛樂二十二歲蒙召，到慕廸聖經學院念神學 (1927-1931年)，期間讀了幾本有關內地會的書：《神蹟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戴德生的傳記及博德恩的生平 —— 《忠心的管家》（Mrs Howard Taylor, *Borden of Yale*，又稱*Man of Faith*）而知道中國西北穆斯林的需要。[134] 到中國後，他與其他新員接受了起碼六個月的語言訓練，並通過第一次考試。

---

[132] "Emil Fischbacher."

[133] Otto F. Schoerner, *Serving Christ* (Focalpoint Images, 1997), available from <http://www. schoerner.org/>, chap. 4, China; "Emil Fischbacher."

[134] Shuster, Interview of Otto Schoerner, Collection 55, T1 Transcript and T2 Transcript, Billy Grahm Center,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eaton.edu/bgc/archives/trans/055t01.htm> (accessed 28 July 2010). Xiaoxin Wu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d ed.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e History, 2009), 142; Schoerner, Serving Christ, available from <http://www.schoerner.org/>.

趙立德在中國出生和成長，他的父母是駐中國的傳教士。當他感到上帝呼召他在中國服侍時，他開始看見當時中國一千萬穆斯林的福音需要，於是他求印證並得着 —— 他收到父母的信，告訴他在他出生時已將他奉獻給上帝服侍穆斯林，也改他的名字為Raymond，這是按第一位穆斯林傳教士雷蒙．勒爾（Ramond Lull）的名字而改的。[135]

何仁志透過朋友接觸福音信了主，因讀了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的《絕對順服》（*Absolute Surrender*），便懷着感恩奉獻自己事奉上帝。然後他又因為讀了《億萬華民》和《神蹟千里》，以及之前在新加坡讀書接觸過華人的經歷，於是回應中國的需要。[136]

朱佩儒屬倫敦北部的Salters Hall Baptist Church會友，他的母親在兒子還未出生前已將他奉獻給神為宣教士。1928年，朱佩儒在一個宣教聚會聽到東方未得之地的挑戰，1929年便申請為內地會傳教士，並於1931年前往中國。[137] 朱也讀了*The Reproach of Islam*而回應穆斯林的福音需要，不過他於1938年改變了他起頭對穆斯林的負擔。[138]

新傳教士來華都是為了傳福音，每個人的蒙召都是獨特的，卻懷着相同的目的 —— 傳福音。他們中間起碼有五人，都是領受了文字刊物中的異象傳遞而走上傳道之路。趙立德、朱佩儒及石愛樂都對穆斯林有負擔。

六人中，只有巴富羲是醫生。處理傳教士申請的委員會表示，當他們處理巴醫生的申請時，便為上帝應允差派醫療傳教士的祈求而感

---

[135] "Mr. R. H. Joyce," *China's Millions*, October 1931, 186.

[136] "Reinforcements," 225; "A Second Valedictory Meeting," 14.

[137] *China's Millions*, October 1931, 184-85.

[138] "Minutes of Council Meeting Hold in Shanghai on May 3," 1938, 9 (397).

恩。[139] 此外，石愛樂在慕迪聖經學院時也攻讀了宣教士醫療科，學了簡單的醫學，主要是牙科，之前在夜校更學過商業管理，因此蘭州博德恩醫院成為他在撤離新疆後繼續在中國事奉的下半場所在。[140]

b. 痛失訓練新傳教士的接棒人和唯一的醫生成員

1932年8月，只接受了兩個月語言訓練的巴富羲醫生，跟隨到來接新傳教士的胡進潔，從上海到北京預備前往新疆的旅程所需物品，包括到天津買兩輛貨運卡車。胡進潔來時本由迪化到俄羅斯，經西伯利亞鐵路到滿州、北京，然後到上海；但現今帶着新傳教士回去時，卻因中日戰爭（自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又稱「滿州事變」，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淪陷，1932年日本還扶植了滿州國）而不能走相同的路。於是他們打算以貨車自內蒙，經甘肅到戈壁沙漠入新疆。[141]

胡進潔和巴醫生在北京會合其他隊員，一行七人於9月13日起程，10月14日到新疆，17日到哈密，正遇上馬仲英（穆斯林）叛亂（趙立德和石愛樂報告消息時表示騷亂是因省長金樹仁的暴政引發的）。[142] 因為主要道路不通，他們直至11月9日才終於到達迪化，由北京到迪化總共花了兩個月時間。他們這六位新丁到達後就交由已在新疆事奉了二十三年的資深傳教士馬爾昌指導和管理。

---

[139] *China Inland Mission, 1865-1951, from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Part 3: Minutes and Paper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Reel 45, 16: "Minute book including material on the CIM withdrawing from the Conference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an guidelines on accepting candidates, 18/4/1928-20/12/1933."

[140] "Papers of Otto Frederick Schoerner – Collection 55,"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eaton.edu/ bgc/archives/GUIDES/055.htm>, tape 1; Schoerner, *Serving Christ*, chap. 3, Preparation for the Mission Field.

[141] Schoerner, *Serving Christ*, chap. 5, Across the Gobi.

[142] Raymond H. Joyce and Otto F. Schoerener, "News from the Field: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8:1 (January 1934): 12.

當內地會的《月訊》（*Monthly Notes*）報告他們前往新疆的旅程時，描述新疆為「遙遠又有需要的禾場」（distant and needy field），[143] 可見這禾場確有其地理問題和人力的缺欠。胡進潔和新同工們到達時都很感恩，因為經過了重重困難和危險的旅程，他們相信上帝垂聽了很多基督徒為他們旅程而作的禱告。[144] 不過，1933年卻傳出了馬爾昌傳教士和巴富羲醫生的死訊。究竟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當他們到達新疆後，政治環境演變得更差，馬仲英圍攻迪化。巴富羲醫生、馬爾昌等六人立即參加醫院搶救傷兵工作。由朝至晚終日辛勞，同時也向傷兵傳福音。環境糟糕透了，但他們仍然捨己救人，毫無保留。

> 這是一個混亂的戰爭地區，但上帝以祂奇妙的保護帶我們經過……雖然我們處於槍林彈雨之中，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在前省長的要求下，我答應為受刀傷和槍傷的兵士進行重大的緊急手術，而其他傷兵還不斷地被送進來。當我第一次進入醫院時，我見到一個傷兵，他的大腿骨斷開五截 —— 真的可怖！請想一想 —— 超過三百個身上有大大小小傷口的人，他們很多都未曾得到護理。整個醫院真是骯髒，充滿可怕的氣味……我是忙得不得了，沒有醫療器材，甚至沒有醫藥。或許我要學着做信心醫治！[145]
>
> 我真的沒有半點時間，因此未曾能夠經常寫信。有一晚，一位白俄領袖、一位軍官、兩個士兵和我一齊騎馬去看急症，

---

[143] *China Inland Mission Monthly Notes,* September 1932, 2.

[144] "Sinkiang," *China Inland Mission Monthly Notes*, January 1933, 2-3.

[145] "Emil Fischbacher."

> 匆忙間我忘記帶大褸，我的馬如風般飛跑，使我大汗淋漓。當我們回程時，我們因嚴格的命令（注：入城需要特殊的通行密碼〔special password〕）而被留在城門外等候了半個小時，這裏日間很熱，但一旦夜幕低垂時便立即轉冷……當我回到家裏時，我感到身體不舒服。我一直不停工作，也沒有足夠睡眠。醫院總共有超過四百個傷兵，在我的病房便有一百二十五個情況危急。很多都兩三個月沒有沖涼，是異常骯髒。他們沒有足夠的營養，也沒有足夠的醫療人手去照顧他們，以致大部分的擔子落在我們已過勞的外國人身上。過去三個月，我落入中國人的實況之中，而我們或要等候很多年才再看見這樣的福音機會。[146]

後來，巴富羲和馬爾昌兩人均感染了傷寒，相隔三天相繼離世（馬氏：5月24日；巴氏：5月27日）。一個是唯一能接棒訓練新人的資深傳教士，一個是唯一的醫生，都被上帝接走了。餘下的是一個過了退休年齡的老傳教士，更是自1900年一直沒有休過假的老傳教士，帶着五個沒有經驗和沒有足夠語言訓練的年輕人。

巴醫生死於1933年5月27日，終年三十歲。他在中國的日子只是一年零三個多月，而在新疆則是六個月零十八日。他短暫的停留究竟為何目的？《億萬華民》的編者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在年終出版了一期紀念特刊，以 *To What Purpose?* 為題。而在六月版中，巴富羲的同工柏愛生提到政府官員對巴醫生的貢獻給予高度的評價，說他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救別人的人。他寫道：

> 巴富羲醫生，不以自己的性命為念，完全將自己投入照顧傷者的工作，他的委身不僅大大地鼓勵我們，並且感動城中每一個

146 "Emil Fischbacher."

> 人的心。所有等級的政府官員都稱讚他是一個為義而付出性命的人。在記念橫幅上，地方政府寫上幾個大字：捨己救人。[147]

石愛樂則表示「我們仍然沒有全然知道或明白上帝在這件事情的目的」，他只以中國內地會對戴德生離世的認定：「是的，神取去祂的工人 —— 正如祂取去戴德生 —— 但祂的工作繼續」，[148] 來回應同工的驟然離世。

巴醫生的弟弟巴輔勝，本已感召往海外傳福音，但不是中國，直至他哥哥巴富羲醫生和馬爾昌的死，叫他看見中國未聞福音的需要，於是立即於1933年申請成為中國內地會宣教士，1934年1月起程來華。[149] 此外，比徹姆醫生夫婦（Dr. Beauchamp and Mrs. Beauchamp）自願替補巴醫生的位置，[150] 雖然未見達成。希華德夫婦則被任命到哈密來。從這些事件，筆者看見在福音事工上，傳教士是如何前仆後繼的。

馬爾昌死於1933年5月27日，終年五十歲。他在中國的日子是二十三年，而大部分時間（自1914年）是在新疆服侍。馬爾昌留下的全部宣教記錄立即得到整理和出版。一封寫給他姐姐的信寫着對馬的服侍的評價：他（馬爾昌）為別人已完成他的工作（he has finished his work for others）。[151] 讓筆者記起保羅的說話：「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

---

[147] *China Inland Mission Monthly Notes*, July 1933, 3; "News from Sinkiang," *China's Millions*, August 1933, 144.

[148] "Yes, God takes away His workers – as He had by then taken away Hudson Taylor – but His work goes on!" Schoerner, *Serving Christ*, 6. Chinese Turkestan.

[149] "Minute Book 18/10/1933," *China Inland Mission, 1865-1951, from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Part 3. Minutes and Paper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50] "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November 1933, 216.

[151] "Mather: Papers Relating to Percy Cunningham Mather, Letters to Mather and Letters of Condolence after His Death CIM/PP 6, 17/07/1911-15/12/1933," *China Inland Mission, 1865-1951, from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二十24）當胡進潔於馬爾昌死後兩年多再往旅行傳道時，所到之處，仍聽到當地人對同伴馬爾昌的問候「你的同伴呢？馬爾昌先生在哪裏？」很多人仍然記得他。[152]

他們雖然死去，但其生命言行仍然見證、傳遞；他們的工作，有別人繼續着。上帝的工作並沒有停止。

2. 發展期：承傳傳道直至1938年政治環境不許

這件事過後，內地會在新疆傳教工作有以下安排：胡進潔留在迪化；何仁志和朱佩儒到馬納斯（Manass [Suilai]）向維族人和哈薩克人傳福音；石愛樂和趙立德也前往古城（奇台；Kucheng [Kitai]）建立新的福音站。[153] 失去同工對胡進潔帶來沈重的打擊，但這並不阻礙新的傳道中心的建立。不僅如此，1933年11月的《億萬華民》報告，除了兩個新福站建立在迪化的西部和南部，後來還有希華德牧師夫婦（Rev. and Mrs H. D. Hayward）要到哈密去。[154] 在1933年失去兩員後，有人離開（石愛樂在訪問錄音中曾提到其中一人一年後離開到天津結婚；[155] 趙立德於1934年報告時已沒有提柏愛生了，[156] 相信柏氏已離開了），也有新隊員加入。這樣事工延續一直至1938年傳教士要全然撤走的時候。

---

[152] *George Hunter*,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hina's Millions*, January 1935, 11-12.

[153] "Sinkiang: Kucheng," *China Inland Mission Monthly Notes,* August - September 1934, 3.

[154] "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November 1933, 216.

[155] Shuster, Interview of Otto Schoerner, Collection 55, T1 Transcript and T2 Transcript.

[156] Raymond Joyce, "News from the Field: Tihua,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8:1 (January 1934): 11.

朱佩儒和何仁志在馬納斯建新福音站，馬納斯距迪化九十至一百英哩，大概有七個民族：漢、突厥、東干、俄羅斯、哈薩克、蒙古及塔塔爾（即諾蓋 [Nogai]）。不過，傳教士若懂漢語和突厥語，便足以接觸他們。朱佩儒報告工場消息時提到學語言的困難，形容他自己是剛離開安慶學語言的階段，而學中文和突厥語完全是兩回事，兼且在馬納斯實際上不易找到語言老師。他們主要以簡單的醫療工作接觸人，幫助了很多不同民族，但這距離傳道仍很遙遠。他們感到向漢人傳道在語言上比較容易。[157]

石愛樂和趙立德留在古城向漢人傳道。他們繼續學好漢語，完成語言考試。古城也有突厥族人、東干人、蒙古人；他倆也到天山北部向突厥族人傳道。此外，他倆也曾往西邊的Fuyuan、Hoputzu和Santai旅行佈道。[158] 他們每早上做一兩個小時的醫療工作，求診聚集的人數約三百人；他們也很謹慎，不讓這些工作變成他們傳福音的目的。[159] 1937年，趙立德提到有兩個信徒（一個已信了約二十年；另一個是新信徒）。[160] 他在古城與穆斯林接觸（1934-1938年），對東干人傳道並不容易，因政治情況，東干人被監視着，以防叛亂。[161]

1936年，希華德牧師夫婦終於等到新疆的道路重新開放和獲得簽證，他們到了哈密，胡進潔早於一個月前待在哈密等候。[162] 他們剛來

---

[157] "In Sore Need of Prayer," *China's Millions*, October 1934, 184.

[158] "New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hina's Millions*, March 1935, 46.

[159] Shuster, Interview of Otto Schoerner, Collection 55, Tape T1 Transcript, 9-10, 17.

[160] R. H. Joyce, "Sinkiang: Kitai," *China Inland Mission Monthly Notes*, February 1938, 3.

[161] Raymond H. Joyce, "The Bible in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14:2 (April 1940): 19.

[162] "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 -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www.scribd.com/mobile>.

到時，見到處盡是頹垣敗瓦（"Everywhere we turn one sees ruins, ruins, ruins."），相信這也是各經歷騷亂的地方的情景。但人們陸續回來，重建家園。最早的是維吾爾族（1935年前稱纏頭），接着是東干人和漢人。傳教士夫婦要盡早學習突厥族語，尤其是婦女當中沒有幾個曉得漢語。藉着醫療，他們很快就與不少維族人建立了關係。

> 我們沒有為將來定甚麼計劃，只是每次踏前一步。我們想將困難的環境化為踏腳石，走向主對我們更大的祝福和我們對主更圓滿的知識，因此我們喜樂，且繼續走下去。[163]

過不了多久，他們仍被逐離哈密，惟有轉到迪化。他們形容迪化的醫院和慈善事業眾多高效。故此，當騷亂過去，迪化的醫院還是夠用的。至於教會是嬰兒階段，並有小型藥房幫助窮人。[164]

1937年的新疆，情況更不利於傳道工作。多處地方仍有回族的叛亂，包括喀什噶爾和莎車，四處被破壞。傳教士到處受監視，也不能自由旅行傳道，因路上要通行證。[165]

此時，何仁志、朱佩儒及石愛樂除了面對新疆政府收緊對傳教士的政策外，也同時面對他們的婚姻大事。首先，何仁志於1937年12月寫信，說他往喀什噶爾與他的女朋友Ellen Ruth Nobilot會合，要在中國土耳其斯坦傳教，但他的女朋友還未被內地會接納做傳教士。[166] 由於何

---

[163] "Among the Chantows of Hami," *China's Millions*, March 1936, 50-51; *Friends of Moslems* 10:2 (April 1936): 53-55.

[164] H. D. Hayward, "News from the Field: Tihwa, Sinkiang,"*Friends of Moslems* 10:3 (July 1936): 60.

[165] "Sinkiang 1937," *Friends of Moslems* 11:2 (April 1937):12.

[166] Nobilet 曾在幾年前被內地會拒絕申請。她後來受了護士訓練，看來適合。但按差會結婚規則，何仁志不能立刻結婚並回新疆服侍。 "Minutes of Council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on July 5," 1938.

仁志並未按行政程序申請得接納才行動，故此總會請他辭職。[167] 在何仁志離開馬納斯後，胡進潔也去馬納斯，幫忙當地的福音工作。

到了1938年，駐新疆的全部傳教士都要撤離，包括喀什噶爾的瑞宣教會，那時他們的教會已發展到二百人。[168] 為甚麼傳教士被逐，要撤離新疆？瑞宣教會的栢森（C. Persson）提供了以下原因：（1）不是因為毛拉，在穆斯林騷亂時曾一時關係緊張，但過後關係又友善下來。（2）不是因為新疆人民，他們很少製做麻煩，除非受煽動。（3）是因為政府，受蘇聯影響，甚至受控制。[169] 栢森以三十年代前新疆各民族都和平共處，都歸功於前任省主席楊增新的聰明卻保守的管治，但省主席轉了金樹仁及盛世才後，政府的地方管治便每況愈下。栢森的看法與胡立禮一致，以楊的為善政。外國傳教士的傳教事業在金樹仁和盛世才治下都不能直接建立下去，甚至被禁停下來。

年輕的內地會傳教士首先一起經印度離開，一個接着回倫敦，兩個往上海。[170] 朱佩儒往倫敦，他於1938年1月從馬納斯寫信申請放假，表示以往因讀 *The Reproach of Islam* 而對穆斯林的福音需要作出回應，現今已有改變。他轉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屬靈需要有感動，計劃放假後入讀倫敦大學三、四年。他的女朋友Whiley願意與他一起服侍，後來她曾因健康問題被內地會拒絕申請。中國議會不接受他的讀書計劃，並議決他若堅持便結束他與差會的關係。[171]

---

[167] "Minutes of Council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on May 3," 1938, 9.

[168] C. Persson, "Christianity in the Taarim Basin," *Friends of Moslems* 14:2 (April 1940): 21.

[169] Persson, "Christianity in the Tarim Basin," 20-23.

[170] Hermansson, "News from the Field: Sinkiag,"*Friends of Moslems* 13:4 (October 1939): 76.

[171] Minutes of Council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in 1938 (n.d.), 4-5 (397-98).

石愛樂和趙立德到上海。他倆自到新疆傳道後一直工作至1938年。石愛樂撤離後便到上海與女朋友道清潔（Katie H. Dodd）會合，然後結婚。1939年回美述職，1940年啟程回中國，轉到蘭州的博德恩醫院做行政管理。1951年才離開中國返回美國。後來他寫了自傳《服侍基督》（*Serving Christ*）。趙立德於1939年與Catherine Mona Miller結婚，1941年休假，1946年去了雲南繼續向穆斯林傳福音，1951年離開中國。[172]

希華德夫婦仍留在迪化工作，但舉行崇拜已愈來愈困難，來的人都會被調查，詢問為甚麼參加？聽了甚麼？這時期在喀什噶爾的瑞宣教會已經撤離。[173] 希華德兩夫婦堅守至最後（除胡進潔外），於1938年9月9日離開迪化，經印度撤離。從迪化到邊境行李被搜了七次。[174]

至於胡進潔，1938年11月底他仍在伊犂服侍。[175] 在希華德夫婦離開後，他繼續留下來，但不容許做福音工作；[176] 直至盛世才以間諜罪拘補了他。被監禁十三個月後，因證據不足，於1941年7月被逐至甘肅。[177] 他一直希望新疆重開；1946年12月20日在回新疆途中病故。去了喀什噶爾的何仁志已婚，夫婦倆在瑞宣教會撤離時，仍留在喀什噶爾的Srinagar，接觸新疆的突厥人和中亞的穆斯林。[178] 1945年，當盛

---

[172] 參Raymond Joyce, "Islam in Yunan," *China's Millions*, March-April 1941, 29.

[173] Hermansson, "News from the Field: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13:4 (October 1939): 76.

[174] "News from the Field: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14:1 (January 1940): 13; "Watchman, What of the Night?" *China's Millions*, May 1940, 75.

[175] Hermansson, "News from the Field: Sinkiang,"76.

[176] Raymond H. Joyce, "News from the Field: Sinkiang," (January 1940) *Friends of Moslems* 14:2 (April 1940): 28.

[177] Raymond H. Joyce, "Changes in Chinese Turkestan," *Friends of Moslems* 18:2 (April 1944): 12.

[178] Joyce, "News from the Field:Sinkiang," January 1940, 28.

世才落台後，中國基督徒佈道十字軍（中華傳道會前身）的女傳道翟明霞自願前往新疆開展福音工作，並在迪化建立了新疆華人基督教會（Sinkiang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及其他分堂。此外，還有其他信徒到新疆各城鄉（如酒泉、南疆等地）去。[179] 外國傳教士的傳教工作禁停了，但本土傳道的工作卻展開了。

三　結語

中國內地會二十世紀初在新疆的基督教事業，大致分為兩大時期：（1）傳道先鋒在新疆傳道的建基和撒種期（1906-1932年）；（2）後繼者承接和發展事工期（1932-1938年）。在建基和撒種期間，內地會在新疆本來已比於1892年展開基督教事業的瑞宣教會起步遲，再加上人力資源少（胡進潔，1906年起；馬爾昌，1914-1932年；「三婦女」，1923年起；胡立禮，1926-1932年），一直做開荒工作。從胡進潔和馬爾昌的單身狀況和不容自己休假的情況，更確定新疆的困難環境和傳教人力奇缺的問題。當俄羅斯經歷1917年革命及後，處於其邊境的新疆，尤其是迪化，因着政治敏感，兩位傳教士在該地域不能照常於福音站崇拜傳道，便較專注於編譯語言文法和字典等的文字工作，以準備後繼的人更能掌握語言的學習。

---

[179] "News from the Field: Tihua, Sinkiang, Extract from Letter from the China Native Evangelistic Crusade, Shanghai (3 June 1947)," *Friends of Moslems* 21:2 (April 1947): 42提到中國基督徒佈道十字軍的同工翟明霞與丈夫李開煥於1945年到新疆佈道，丈夫是以郵政局的工作身分被調職新疆迪化的。到埗後三個月便接觸到基督徒，並得到政府允許，建立了教會。Li k'ai-huan, "News from the Field: Tihua," (22 May 1947) *Friends of Moslems* 22:2 (April 1948): 25. 也參Raymond H. Joyce, "News from the Field: Sinkiang," *Friends of Moslems* 19:1 (January 1945):7提到中國基督徒的聖經在哈密被警察沒收，並且有一位基督徒將軍到那裏去被遣回。一方面傳道情況並不好，一方面本土傳道興起。

在第二階段時期，本來是加強人手發展傳教事業的，卻遇上三十年代回族馬仲英在新疆哈密、迪化等地的騷亂，並且一開始就失去了兩個成員 —— 一個資深的接棒傳教士訓練員馬爾昌，一個唯一的傳教士醫生巴富羲。雖然如此，傳道的工作仍然繼續，並且發展。自迪化，發展至古城和馬納斯；繼而有希華德夫婦加入，拓展傳教事業至哈密。但他們在哈密只停留短暫的日子，之後便離開轉到迪化來。這些內地會宣教士 —— 因着新疆民眾分散居住 —— 都在福音站所在承擔着不輕（每天診治近百甚至上百人次）的簡單醫療工作。他們雖然沒有建醫院，他們也不是正式醫生，卻盡量滿足醫院外民眾對醫療服務的渴求，在當地實是非常到位的服侍。趙立德以下的說話總結了他對新疆事奉的評估：

> 究竟這廣濶面積的地方，等於五分之一的美國和有五百萬的人口，究竟為耶穌基督的教會帶來甚麼問題？是的，一個問題，就是傳福音……筆者是內地會於1932年差往烏魯木齊（迪化）作為支援的六人之一；如果我們不是「太少」，我們便是實際上「太遲」。[180]

足夠的人力和適合的時機，都是重要的。

到1938年，政治環境又再變遷，有地區騷亂，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從親蘇聯轉為靠攏國民黨，以騷亂為蘇聯引發；加上日本侵華不斷伸展勢力的問題。當其時要所有福音站的外國傳教士撤離新疆。政治因素不僅禁停了內地會的福音工作，同時也使瑞宣教會所有傳教士撤離新疆。在人力因素方面，內地會可以招募得到解決；但政治因素，卻一時衝毀了傳教士所建立的事業。無論如何，在人心建立的傳道工作仍然存留。

---

[180] Joyce, "Changes in Chinese Turkestan," *Friends of Moslems* 18:2 (April 1944): 12.

一個傳教士倒下去，有後繼者到來；一道傳道事業的門被關上，傳教士便去開啟另一道門。在人心建立的傳道工作仍然存留，上帝的工作仍然延續着。

撮　　要

本文研究二十世紀初中國內地會在新疆的基督教事業的歷史，尤其是影響其發展的歷史因素。筆者發現不是傳教士以傳道為主的進路，也不是與哈薩克人的文化衝突，而是缺乏人力和地方政治不穩。傳教士事實上卻因應當地人的需要，熱誠地參與傳教地區的醫療服侍，並藉之接觸當地人向他們傳道；而與傳教士衝突的主要是在地方騷亂時的纏頭（維吾爾族）的宗教領袖。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y of China Inland Mission's Christian ministry in Xinjia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especially looks into the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stry.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neither the evangelistic approach of the missionaries, nor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m and the Qazaq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ather, the lack of manpower and the loc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issionaries were in fact, in response to the local needs, enthusiastically involved themselves in medical services, and through the services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local people and preached to them. Those who came into conflicts with the missionaries are mainly the religious leaders of Chanteos (Uighur) during the time of local riots.